

《松游小唱》与松茂“茶马古道文化”^{*}

张 起

(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 清代羌族诗人董湘琴的纪游长诗《松游小唱》展现了松茂茶马古道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诗歌虽曾口口相播, 但范围局限于松茂古道沿途, 时至今日, 诗歌的价值已几近被历史所湮没, 发掘、整理《松游小唱》的历史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 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而言, 《松游小唱》作为地方文化先贤的重要遗著, 反映松茂茶马古道沿线羌藏回汉聚居地文化生存状态的宏大诗篇, 也是应该予以保护的, 并且极具发掘的价值和必要性。

〔关键词〕 羌族文学; 董湘琴; 松游小唱; 松茂茶马古道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1-0147-09

松茂茶马古道是以灌县(今都江堰)为起点, 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为终点的一条全长 700 多里的古代交通要道。自唐宋到明清, 再到民国末期, 灌县城内的马店、客栈, 鳞次栉比, 繁荣了一千多年。

羌族诗人董湘琴名朝轩, 号玉书, 又字香芹, 灌县(今都江堰市)人, 祖居虹口, 后迁居城关白果巷, 自建腕腴精舍。其生卒年月, 无确切记载, 据有关资料推测, 大约生于 1843 年, 卒于 1900 年。董湘琴自幼聪颖好学, 通文史, 长诗赋, 是清末川西地区著名文人学士, 诗人年轻时风流俊雅, 自负不凡, 尝以戎马书生自命, “尹席珍老先生八十八岁时为《松游小唱》作序, 曾回忆说, 他与董湘琴‘琴歌酒赋, 常相往来, 同人皆以玉堂人物目之, 盖其精妙之思, 隽永之词, 有非朋辈能望其肩背者。’”^{[1](p120)} 然而时值清末, 朝政腐败, 社会黑暗, 民生凋敝, 满腹经纶的董湘琴虽抱宏伟之志, 到光绪十一年(1885)才取得贡生的功名。豪侠任性的诗人曾

于同治十一年(1873)加入哥老会, 并被尊为“冒顶”(袍哥舵把子), 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督川, 董湘琴在清政府镇压袍哥组织的行动中受到牵连下狱, 后在舆论声援下获释。光绪七年(1881), 松潘地区发生藏民动乱, 松潘厅总兵夏毓秀督师平叛, 翌年九月董湘琴应处境艰难的夏毓秀的再三邀请, 于灌县出发赴松潘厅任幕僚, 赴任途中, 诗人为松茂古道沿途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古迹掌故所深深吸引和触动, 由此一路游唱一路狂吟, 写成了长篇纪游诗《松游小唱》。大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 董湘琴厌倦官场的诈伪, 辞归乡里。后遭遇夫人离世的打击, 大约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诗人亦便早早逝世了。诗人离世后, 作品大半散佚, 只留下《松游小唱》和少数诗作。

蜀道难天下闻名, 历史上因蜀道而成诗的有李白《蜀道难》、董湘琴《松游小唱》等; 借蜀之山川寄意抒怀, 写到松茂沿线的诗作诸如杜甫《西山》、薛涛《筹边楼》及在松潘写给韦皋的

〔收稿日期〕 2013-09-02

〔作者简介〕 张起(1963-), 男, 四川崇州人,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唐代文学、地方文化。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董湘琴《松游小唱》校注、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11YJA850030)阶段性成果。

《罚赴边上韦相公》、岑参《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垒山思故园见寄》、贾岛《送玄岩上人归西蜀》、范成大《最高峰望雪山》等等。董湘琴的《松游小唱》可以说是所有这些作品中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它反映了松茂茶马古道文化的全貌。七百里松茂茶马古道上的景物风情，古迹名胜，历史掌故，神话传说，《松游小唱》尽皆囊括。在这幅松茂茶马古道的风情画卷里，有对壮美山川的颂扬，也有对藏羌民族民俗风情的展示，同时又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满清王朝衰败没落的社会现实，可谓包罗万象。长诗不仅内容丰富，语言亦是行云流水，自然晓畅，诗歌既坚持语体的通俗，又不乏文言的典雅，颇有郑板桥《道情》之风，别具一格。同时，诗人又富有创造力地把川戏唱词和川西曲艺引入诗歌，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这样亦俗亦雅、且吟且唱、用典考究却力求通俗易懂的诗歌创作风格，在晚清的中国诗坛无疑是一个创举，这样的创作探索对于世纪之交的巴蜀乃至古典诗歌创作的转型都具有承上启下的指导意义。许多诗人或评论家对其予以高度的评价：如诗评家李村称其为诗派中新的一种“湘琴体”，老诗人白航称其为“解放体”，袁和风认为其开创了“自由体”。著名诗人贺敬之也曾对这首长诗作过论述，指出它“在我国传统诗歌形式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诗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2] [p138]}在长诗的创作过程中，诗人可谓颇具匠心，“茂州北上渐登坡，左山右河，文章依旧多重复”，^{[1] [p47]}可见诗人在创作中并不拘泥于对古道风貌进行乏味的宽泛描写，而是写众之未写，写古道风貌的独特。这样的创作原则，自然能为《松游小唱》的成功创作奠基。另值得一提的是，《松游小唱》是我国古典诗歌史上最后一首边塞诗，董湘琴松游之行历程七百里，对松茂古道沿途边塞风光的描写之详尽是前人所没有的，诗人也借此抒发了晚清文人壮志难酬，中年方才入幕的复杂情感，引后来文人学士共鸣。《松游小唱》在今天就如一颗被历史的沙尘埋没的珍珠，它的价值亟待今人的挖掘和公示，本文将从这首长诗出发，试图领略七百里松茂茶马古道文化。

一、岷江河谷地域文化

岷江河谷特殊的地域文化，与《松游小唱》

的产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岷江河谷贯穿了董湘琴的松游之行，可以说正是岷江河谷地域文化从松潘之行的最初就对董湘琴产生了强烈触动，才有了《松游小唱》的创作，而《松游小唱》又将岷江河谷地域文化更加丰满和绚烂地展示了出来。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岷江河谷，陵谷沧桑，今已面目全非，对岷江河谷地域文化抢救的必要性显得更加突出，从这一角度来看，《松游小唱》中关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展示无疑是珍贵的研究材料。董湘琴的松潘之行，每一步都踏在岷江河谷的脊背上，无论是岷江河谷的自然地理风光、历史人文景观还是民俗风情，诗人都有着最切身的感受，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脉搏与诗人敏感的创作冲动产生着强烈的撞击，进而通过《松游小唱》，一字一句地呈现出来。

（一）自然地理风光

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一大表现是岷江河谷特殊的地形地貌和自然风光交合形成的地域文化。岷江河谷既孕育着雄奇壮美的山川河谷，也座落着宁静秀美的山间村落，景物的一张一弛契合着董湘琴诗情的跳跃，对此景此情，《松游小唱》有着充分的展示。“三埡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的脍炙民谣是岷江河谷地形地貌的绝佳写照。诗人西游第一程，高仞虎头关，放眼望去，“江山雄构，大江滚滚向东流。恶滩声，从此吼。灵岩在前，圣塔在后，伏龙在左，栖凤在右，二王宫阙望中浮。好林銮蔚然深秀，看不尽山外青山楼外楼。”^{[1] [p4]}这是出灌县西街，过镇夷关的一段古道。都江堰山川风物尽收眼底，灵岩寺、伏龙观、观凤楼、二王庙伴着都江堰的滚滚江流共同构筑起了一幅壮美的山川图画，极目远眺，山林异常茂盛、层峦叠嶂，又是一派秀美气象。诗人对所见景物风貌进行粗线条的勾勒，巧妙地把该地壮美秀丽的人文地理景观和自然风光融合，展示出了都江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行行至白沙，路转西斜。平畴入望野桑麻，小桥流水，是一幅苏州图画。舟人自舟，筏人自筏，生涯在水涯。回首灌城，茫茫雉堞在巉崖挂。长桥竹索横空跨，过桥来柳阴闲话。”^{[1] [p6]}白沙旧为有名的水陆码头，岷江上游木材集散地，《华阳国志》称“白沙邮”，邮，古代传递文书的驿站，诗人行至此地，平缓的江

流上时见竹筏，岸上则是小桥流水伴着桑麻人家，走过索桥，休憩于柳荫下，恍若置身江南水乡。寥寥数语，岷江河谷宁静秀美的独特地域风光便跃然纸上。

诗人进入龙溪地界，岷江峡谷的峥嵘初露端倪，“又五里龙洞前面，洞头流水响潺潺，千寻石壁撑霄汉，外衬着藤萝点染。摩崖大字‘关塞极天’，恐黄荃、米癫，笔法无此奇健！”^{[1][p8]}经娘子岭，山险路陡，“坎有高低，弹丸走坂须防备！最怕是狭路逢弯，肩舆簸荡空中戏。俯视深无底，令人惊悸。”^{[1][p11]}娘子岭为进入岷山河谷的第一高峰，横亘行人面前，又不能顺河谷沟口行走，为松茂古道上爬坡最长的一段山路。至桃关，岷江峡谷已然起势，“风景渐难看，河在中间，山在两边，九曲羊肠，偏生挂在山腰畔。抬头一线天，低头一匹练，滩声似百万鸣蝉，缠绵不断，搅得人心摇目眩。”^{[1][p14]}过飞沙关，心惊胆战，“路曲又逢弯，弯外鸣滩，银涛雪浪飞珠溅，飞到山颠，点点湿征衫。风猛烈，水喧阗，风声水声搅成一片。纵有那健儿百万齐嘶喊，强弩三千，也射不得潮头转。澎湃吼终年，恐项羽章邯，亦无此鏖战……由来此地称天险，把滟滪、瞿塘上油独占。万流奔赴一深潭，不敢低头看。方信到如临深渊，兢兢战战。”^{[1][p21]}这几处描写，诗人以精炼流畅的笔调刻画了岷江河谷山川峡谷的独特状貌，从视觉、听觉的角度描写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加之以贴切的比喻和跳跃性的联想，将岷江河谷地理山川雄、奇、险的特点生动自然地呈现了出来，读之有如身临其境，令人感叹岷江河谷地形地貌的雄奇壮美。

（二）历史人文景观

岷江河谷地域文化也体现在其独特的人文景观上，这里既有闻名于世的水利都江堰等历史人文古迹，也有众多特色鲜明的藏羌民族人文景观。对此，董湘琴的《松游小唱》都有展示。

1. 索桥

索桥（又名竿桥、竹桥）在川西河谷地区起源较早，颇为常见，《水经注·江水》云“渡江有竿桥。”旧时多以竹索为建筑材料的缆桥，是岷江河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诗中就写到了安澜索桥。前227年，秦蜀守李冰筑堰，《华阳国志·蜀志》载“冰乃壅江作棚，穿郫江、检江，别之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又灌溉三郡，

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3][p.202]}都江堰的历史功绩不容置喙，董湘琴对于家乡的这一伟大古迹自是钟爱有加，从《松游小唱》开篇对历史古迹灵岩寺、伏龙观、观凤楼、二王庙的一番描写中，都江堰开阔宏大的状貌可见一斑。著名的安澜索桥就建在鱼嘴分水堤前。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有对此桥的详载“绳桥长百二十丈，分为五架。桥之广十二绳相并排连，上布竹笆。横立大木数十于江沙之中，犇石以固其根，每数十木作一架。挂桥于半空，大风过之，掀举幡幡然，大略如渔人晒网，染家晾帛之状。”岷江滔滔恶浪，没有修建索桥前，民谣有“走遍天下路，难过岷江渡”之说，后人称“安澜桥”有行人狂澜安渡之意。对安澜索桥，董湘琴有此记述“回首灌城，茫茫雉堞在巉崖挂。长桥竹索横空跨，过桥来柳阴闲话。”^{[1][p.6]}安澜索桥于都江堰鱼嘴上如飞虹挂空，漫步桥上，西望岷江穿山咆哮而来，东望灌渠纵横，都江堰工程的概貌及其作用，更是一目了然，诗人用“横空”一词，将横跨内外两江的500米安澜索桥生动地展示了出来。

2. 禹乡

岷江河谷是我国羌族聚居地，素有大禹故乡之称，大禹生于羌的记载在古文献里常可见到。《元和郡县图志》记述“广柔故县，在县西七十二里。汉县也，属蜀郡。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其地名剏儿坪。”^{[4][p.812]}诗人途经飞沙关时写道“飞沙岭连飞沙关，岩刊石纽山，相传夏后诞此间。《蜀王本纪》：禹生广柔，隋改汶川县。凭指点，剏儿坪地望可参。今古茫茫，考据任人言。我来访古费盘桓，总算是尽力沟洫称圣贤，有功在民千秋鉴。”^{[1][p.19]}诗人在此对禹出生地的追述和对禹之功绩的追思，客观上起到了将禹羌文化以诗歌的形式广而告之的作用，使世人对此有了更广泛的了解，也引发着人们对羌民族史乃至华夏民族史的思考和追问，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3. 威州——用兵之地

行近威州（今汶川县），姜维城出现在诗人笔下“姜维城下起笳声，促征人。”^{[1][p.31]}古城堡姜维城是蜀汉建兴九年姜维率兵平羌时所建，

今天的姜维城只剩下一个较为完整高约七米的土墩，呈圆柱形，类似古代的烽火台，当地人称之为“点将台”。百年前的董湘琴远远望见姜维城，闻茄声四起，凉月深秋，苍凉萧索的古战场状貌油然而生。今天的汶川雁门关古属松州，为松茂咽喉重地，历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留下了周仓背石塞关，脱靴倒沙而成山的传说。诗人当年游访至此，对其有一番记述“锁钥西来一雁门，是松州重镇。边气郁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滚。周将军到此何曾？偏有这脱靴痕，双撑如笋。长途有空城，塘所烟墩，汉唐古迹今犹剩……明妃出塞最销魂，青冢黄昏；纵文姬寒食归来，已不堪飘零红粉。”^{[1] (P.35)}诗人描述了雁门关的险，写到了传说中周仓所倾之沙已成撑天石柱，又触景生情，由古战场遗迹想到了出塞的昭君，归汉的蔡文姬，抒发其松游的飘零伤感之情，这样的情景交融，将人文古迹的历史风貌更加有血有肉地呈现了出来，颇有唐代边塞诗之遗风。

4. 茂州——“神禹乡邦”

在茂州（今茂县），诗人有感于此地的人文积淀发出了“神禹乡邦”的赞叹。诗人过七星关，渡白水寨，经周仓坪，见石鼓而触景生情，写道“石鼓石生成，却少个张生歌文，昌黎题咏。”^{[1] (P.42)}诗人看到石鼓，感叹此石鼓没有张生的石鼓文和韩愈的题诗。张生曾把石鼓文拿给韩愈看并劝其题咏，韩愈由此作七言古诗《石鼓歌》，凡六十六句，开头两句便说“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5]在今茂汶以北五十三公里处的较场，是古蚕陵县练兵所在地，诗人行至此地写道“较场路平，尽都是石板镶成。将台是古迹，龙池对面横，不觉又过孟良城。”^{[1] (P.65)}相传北宋的佘太君挂帅西征，曾在较场练兵点将，部将孟良曾在今孟良城屯兵。“龙池”在叠溪海子西面，与较场相对，传说境内原有一湖，内有龙蛰伏，遇晓吐烟，似月光映照，旧为叠溪营八景之一。诗人历叙较场、将台、龙池、孟良城，留给后人凭吊。

5. 松州——旅游、宗教胜地

古松州即今天的松潘县，这里的黄龙洞在今天仍然是旅游胜地，诗人至此写道“此处山溪，源远流长。每逢三月桃花浪，流出些鱣、鲤、鲦、鲮。额上一点红光亮，这群鱼历有考

详。均云是：龙子龙孙，西海龙王。土人爱惜，不许张罟网。洋洋围围出大江，黄龙古洞通行藏。此地结冰非寻常，高架舆梁，济人来往。”^{[1] (P.79)}这里的溪即纳咪河，发源于松潘东南部高山峡谷，源远流长。“《松潘县志》记载：‘县南归化沟（纳咪河）内有两洞，相传古龙池也。谷雨时有鱼出洞，千百成群，不知所往，至秋分回洞，岁以为常。每出，溪水辄涨，居民恐怖，溶铁封口，大鱼遂不得出。’”^{[1] (P.80)}这种鱼，额头上有红点，当地居民认为是西海龙王的龙子龙孙，不准捕食。当然这是迷信，据考证，此鱼既不是青城后山味江的“味江清波”，也不是岷江上游的“清波鱼”，那么纳咪河怪鱼到底是何方神圣，只能留待鱼类学家来考详了。松潘是藏民文化氛围浓厚之地，这里庙宇众多，喇嘛经幡随处可见，“观音度慈航，莲台人争仰，为善必昌。庙貌魏延香火旺，拾级登临，万点山巅都入望。”^{[1] (P.72)}诗人在这里描写了登临莲花岩见到寺庙中香火旺盛，人们争相瞻仰观音佛像的盛况，可见佛教在古松州的居民中有着巨大影响。行至安顺（今松潘安宏乡），诗人又写到了此地佛教繁荣的盛况“番语重重，喇嘛传经，此地好风气。说什么富贵，讲什么功名，修到活佛智慧，生而能言传真经，生长草地，此事稀奇，此庙在升旗。古树深藏萧布寺，朱楼碧槛列高低。”^{[1] (P.85)}用藏语传经的喇嘛，苦修的活佛，举行仪式的寺庙，在这里随处可见，构成了此地独特的人文气象。

6. 边防要塞

松茂地区是藏羌回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当地少数民族历代皆与内地政权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故沿途设有许多军事要塞以防边患。古道也由此充溢着汉人防夷长期积淀下来的军事气息，行走在这条路上，会让人时刻感受到强烈的军事文化氛围。当时，由川西通往松潘地区的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灌县起行的松茂古道，另一条是绵阳江油经由石泉平武至松潘之道。董湘琴在长诗中写到的威州（今汶川县），与茂州北部的翼州（叠溪古城），皆扼松茂古道之咽喉；此二州东北部的龙州（古龙安府，辖今平武、江油、石泉、彰明四县），则是石泉至松潘这条道的要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威州、翼州、龙州形成了三州守卫川西的军事态势。威州自汉代

建制汶江、绵虬、汶山，历代皆为军事要地。《松游小唱》写到三国时姜维于此地平羌时所建城垣遗址尚存；冀州为唐时所置，此地（叠溪古城）汉代即置蚕陵县，历来皆为边防重镇，扼川西平原通松潘旱地及青海、甘肃交通要塞。1933年遭遇7.5级的叠溪大地震，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叠溪重镇垂直陷落500米后永远地消失了，今天的叠溪城旧址，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叠溪海子；龙州更是川西东北部军事咽喉之地，《四川通志》载平武县关卡众多，仅县西北就设有石虎关、羊肠关、旧关，“郡连氏羌”，^{[6]（P.698）}“西关设镇羌楼”，^{[6]（P.879）}《四川通志》称石泉县“控制西夷，藩篱内郡……扼松茂之咽喉。”^{[6]（P.881）}据《四川通志》：“彰明县，北接汉中，东临涪水……控松龙之门户，扼潼绵之咽喉。”^{[6]（P.698）}三国时，邓艾取道诸葛亮视作咽喉的江油关阴平小道，一举入川灭蜀。在汉夷分界的川西北地区，阻遏匪患是此地历朝历代的重要主题，唐代对此三地以州建置，既说明了这一地区边患之重，同时也是这三大军事关隘具有重要地位的佐证。建置以来，一方面，这三大军事重镇有效地抑制了边地的动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保证了汉夷杂居地区较为稳定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这些城池关隘作为一个军事要塞而存在的同时，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文化交流极为活跃的节点，这样它们就必然发挥着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无论是对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还是对推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都有着极为深远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一作用，到清朝末期，边地少数民族开化水平显著提高，这些军事要塞的地位也随之下降，直至消泯。董湘琴《松游小唱》写到的威州、茂州、松潘古城，都有着这样的军事和文化意义。

（二）多民族民俗风情

岷江河谷沿线地区居住着藏羌回汉等民族同胞，沿线地区独特的民风民俗是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又一大特色。

这里的少数民族同胞热情好客，朴实大方，诗人沿途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十里过街楼，山明水秀，好风景在场头。驻马场口，整冠束袖，特地访名流。尚家昆仲无与俦，白眉尤属后来秀。姑勿论九世明经，吾乡罕有，只此腹笥便便，也算得文坛耆宿。一笑登堂语不休，清茶一

瓯，强如座对闲人酒。非我爱勾留，是西来好友，是生平畏友。欲别又绸缪，殷殷话旧。大丈夫各有千秋，赠言强当临歧柳，抵多少河梁携手，送我在雁门口。”^{[1]（P.34）}这里诗人写到了自己途经汶川过街楼，作客当地名流尚家昆仲的情况，书香门第的尚家，热情接待了诗人，席间主客相见恨晚，把酒言欢，临别之际依依话别，教人感慨，少数民族淳朴好客的民风在字里行间得到了极大的展现。

岷江河谷是藏羌回汉等民族的聚居地，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农耕、狩猎、放牧混合的生活方式。《松游小唱》对此作了生动的描写，比如在得胜堡，诗人就见到了一幅牛马成群，黍麦如茵的农牧田园生活图景“得胜堡，好柳林，垂杨柳青复青。芳草如茵，任牛马纵横。牧童唱歌人难听，咿唔怪声，如马嘶天宇，骡叫众惊。日之夕矣，三百维群。此处物产多繁盛，却少个水榭风亭，待诗人题咏。上街来分外清静，板桥上尚有霜痕。隔岸好山青，下寺是地名。黍油麦秀，原隰杳杳。”^{[1]（P.83）}在平夷堡，诗人又描写了此地农牧居民自在无拘、闲适安逸的生活状态，有如岷江河谷的世外桃源“问土人如何生活？出入深山与穷谷，置弩埋药，要等待獐鹿兔鹿，山珍可口，衣丰食足。行数里，上大陆，扬鞭策马真快活。耕者自耕，牧者自牧。童子骑牛唱歌，声回山谷，虽无调无腔，也算是田家之乐。”^{[1]（P.75）}董湘琴为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岷江河谷这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将岷江河谷地区这种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和谐共处的抽象状态以形象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岷江河谷独特的交通工具溜索是一大特色，诗人对此写道“场口闲游玩，见人行溜索飞如箭，到头来捷似猱猿。小留连，也要算书生涉险如开眼。”^{[1]（P.15）}在交通为沟壑峡谷隔绝之地，溜索横空架于两山之间，行人背负溜筒，自高而低，从索上溜向对岸，俗称“溜壳子”。

途经七百里松茂古道，诗人看到了各种富含民族风情的民族服装，展示了岷江河谷地区具备别样风情的特色文化，如在太平山萝卜寨对羌族妇女服饰装扮的描写，颇似一副羌族风情画：“夷人妇，装束怪，两个大锡圈，当作耳环戴，青布缠头，红毡腰带，白衣黑裙大花鞋，别有一番气派。此种人，真奇怪，可为万国入种图

上载。”^{[1] (P. 69)}

二、松茂古道“茶马”经济文化

说到松茂茶马古道的贸易活动，自然就会想到活跃于古道上的特色运输队伍——马帮。董湘琴在松潘之行的途中，对于马帮队伍就有所见闻。在途经茂县北部的崎岖山路时，诗人写道：“山势嵯峨，斧斤伐尽牛山木，人见其濯濯。尽不少神骏千金，骅骝、騊駼，一步一蹉跎。药裹东来用马载，茶包西去换牛驮，小载有驴骡。铜铃一颗，铃声响应鸣山谷。外还有马夫骡脚，腿似琵琶，身如车轴。胡文忠选士有科，若叫他疆场效命，荷载横戈，赳赳怕不是干城佐！”^{[1] (P. 47)}在嵯峨难行的山路上，诗人见到往来不绝的牛马队伍，驮着盐巴、茶叶等商品，这雇工队伍中，身体矫健的背夫尤为引人注目。背夫是茶马古道人力运输的主力军，在背夫的背上，架着上过头下及地的满挂货物的货架。他们往往有着钢筋铁骨般的琵琶腿，他们的身躯或高大强壮，或矮小枯瘦，但他们统一有着坚挺的脊背。可以说，背夫们背起的不单单是往来不断的货物商品，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茶马古道文化。松茂古道作为旧时连接成都平原与松潘茂县的唯一通道，担负着成都平原地区与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物资交换交通要道的重任。从唐代直到近代，松茂古道一直发挥着一条贸易交通要道在经济上的重要作用，董湘琴这里对马帮背夫骡脚队伍的描述，也是对此的佐证。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古道主要依靠牛、马等畜力运输，产生和兴盛于西南边陲，活跃于川西地区的马帮，是松茂古道商贸活动得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松潘县志》记载“牛马驮运为松潘主要运输方式。民间称驮脚、驮驮子、吆牲口，从事此项贩运业的称脚户、牛帮、骡帮或马帮，历来有‘七十二行，脚户最忙’之说，牦牛运输专走草地，骡马运输主要走灌县、平武等地。”^{[7] (P. 512)}马帮在松茂古道茶马互市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松茂茶马古道经济，是马背上的经济。

马帮的历史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大约在东晋时，云南等地的驮马运输已集结成帮。到了清代，云贵川诸省都有若干条比较固定的马帮运输路线，而活动在这些崇山峻岭中的马帮则难以计数。”^{[8] (P. 179)}马帮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原因。

首先，西南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是马帮形成的直接原因。恶劣的地理环境在松茂茶马古道沿线颇为典型，在岷江河谷特殊地形地貌的客观条件下，借助人力的挑运和借助畜力的牛驼马背自是松茂地区最佳的运输方式。其次，西南地区自古盛产良马，这是马帮产生不可或缺的条件。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载“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罗殿、毗那、罗孔……每冬以马叩边……”^[9]良马的大量出产，为马帮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载体。此外，商贸的发展和繁荣，是马帮能够发展壮大的一重要动因。川西地区地理环境复杂，气候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就松茂古道沿线地区而言，灌县等地是驰名的产茶重镇，这些地区的商人将该地优越的资源优势大加利用，积极进行着与藏区的商贸活动，商业因素使马帮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可以看出，马帮能够产生，并且进一步发展壮大乃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繁荣的局面，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促成的。马帮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有其历史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也正是特定历史时期马帮在松茂茶马古道经济中，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经济中都具有舍我其谁地位的最佳佐证。

董湘琴在长诗中记述马帮的笔墨虽不多，但字字可见其用心，浩荡的马帮队伍，体魄堪比疆场战士的马夫骡脚，声荡空谷的骡铃，这样的画面可谓是一幅传神阿堵的古道马帮山水画。实际上在今天看来，马帮的经济价值不再是关键点，其价值已更多地体现在其文化意义上，当然，马帮本身是有其文化内涵的。马帮有其独特的组织形式，“马帮有两种组织形式，专业驮马多有固定的运输路线，专为客商驮运货物；另一种俗称‘农家马’，一般在农闲时参加运输，多走短途。马帮有大有小，大的马帮驮马上千，小的也有几十匹。驮运近者几十百里，远者可至千里之外。”^{[8] (P. 179)}马帮也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他们崇拜山神、路神，尊罗哥为行业祖师，在衣、食、住、行、说方面，都有自己的帮规禁忌，这里不作赘述。经过历史的锤炼，马帮不再仅仅是茶马古道贸易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已然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交通文化符号。董湘琴《松游小唱》中关于马帮的记述，在今天看来恰是为这

一文化符号做的一个醒目的标记。

在茂州“大栈营”，千总守备，再行五里路程，“却原来有‘茶关盘查’四字痕，令尹在关门。休笑他一官清静，也算是闲曹九品。看此地有何风韵，茶包累累，尽都是牛驮马运。”^{[1] (P. 52)}从董湘琴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茶叶是马帮队伍运输的重要物资。事实上，茶叶可以说是唐宋以来“茶马互市”的核心商品，茶叶与马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董湘琴家乡有一种称谓奇特的茶叫“马茶”，茶叶被压缩成砖块状，使得松散的茶叶便于驮运，这种输往藏区的茶在阿坝州流行称“马茶”。可见茶叶在茶马古道商贸往来中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说没有马帮就没有茶马古道，那么可以说没有茶叶这一重要商品，就没有茶马古道经久不衰的繁荣，也难以促成马帮在川西地区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茶叶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在董湘琴百年前走过的松茂茶马古道上，笔者翻阅了《灌县志》：“据1984年辑《四川交通史志文稿·二辑》载，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每年自灌县运往松潘：边茶8000—30000担，粮食10000石，斜纹布5000—10000……”^{[10] (P. 533)}可以看出，在董湘琴走过松茂茶马古道三十余年后的民国时期，茶叶在灌县贸易物资中所占的比重是绝对的大头，不难想象这是对松茂茶马古道以茶叶作为主要贸易对象的贸易传统的延续。

茶叶在当地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也带动了松茂茶马古道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据《灌县志》记述“清咸丰同治间，陕西人在灌县城关开业者有何记丰盛分号、严记又合全号、马记本立生号、继有聚源盛号，时称四大茶号……民国二十五年（1936）后，川帮继起，走松潘大路的有裕国祥、何敏、祥福康民、庆福等茶号；走理县小路者有恒丰久、德厚长、昌隆永、辰丰云等茶号。边茶年总销量在5000担上下，最高年近1万担……民国时期，经营细茶的有大同春、大同庆、复兴、清和雷远记等号，年总销量1400担左右。”^{[11] (P. 454)}茶贸当时在古道沿途地区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据史籍记载，唐宋以来，松茂古道沿途地区特别是灌县就是四川有名的产茶重镇，茶在这些地区的大面积种植和生产，为松茂茶马古道的商品交易提供了强有力的货源支持。松茂古道沿途地区的种茶户借助马帮和松茂

古道实现了商品交易，而马帮和松茂茶马古道的繁荣，也离不开此地充足茶产的助推。

三、松茂茶马古道沿线 社会民风述略

松茂茶马古道蜿蜒七百余里，主要经过了灌县、汶川、茂州、松潘四个地区，沿线区域居住着羌、藏、回、汉等民族，社会民风较为复杂。前文写到了诗人董湘琴在松潘之行的途中，为我们展示的古道沿线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岷江河谷文化，以及繁荣的松茂茶马古道经济，让人领略到了松茂茶马古道沿线令人心旷神怡且欣欣向荣的一面。然而晚清的川西地区毕竟偏远闭塞，这片土地上空萦绕着厚重的封建糟粕阴云，社会民风总体来说是消极落后的。这些地区帮会林立，盗匪作乱，赌博流行，烟毒泛滥，诗人在《松游小唱》中对此皆有所描写，展现了晚清的松茂茶马古道沿线地区社会民风黑暗落后的一面，是珍贵的史料。

晚清的中国，深受鸦片毒害，烟毒的肆虐，置整个中国社会于水深火热之境地。诗人在松游途中，目睹了松茂古道沿线地区官民深受烟毒残害的情状“直向平番走，孤城如斗。此地吸烟男女，十有八九。失业废时久，一切工商皆没有。虽是松属营头，千总守备设有官守，全不思如何挽回，如何补救！劝令烟痞及时休，赶紧把普通知识来研究。”^{[1] (P. 76)}平番只是松潘镇江关的一个小营，而此地吸烟男女竟十有八九，工商业几近荒废，军事机构和政府机关对此毫无作为，诗人除了痛心疾首地于诗文中发劝诫之辞，徒余无奈。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泛滥全国，四川各地，特别是边远地区，遍种罂粟，灌县和松潘，都曾是川西主要产烟区。在灌县，鸦片对社会的腐蚀程度令人震惊“鸦片烟在灌县流行，始自清代中叶以后，光绪年间已遍及社会，上至官绅下至脚夫，成为民间习常。民国十年（1921）后军阀割据，征收烟捐，甚至号召农民种鸦片，乡镇允许开设‘官膏店’，公开营业鸦片。烟捐有烟苗税、瘾民税、过境税、烟馆营业税等。”^{[11] (P. 738)}在松潘，鸦片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源头，《松潘县志》载“清光绪年间，外地商人在松潘试种鸦片成功后，本地人普遍种植鸦片。最初，人们用鸦片医治头痛、发烧、腹泻等

小病，久之上瘾，鸦片泛滥。到民国初期，县城内东西南北大小街巷烟馆林立，十里、漳腊、镇江等地均有‘烟行’、‘生土店’、‘烟膏馆’，吸食上瘾者很多，因吸烟而打架斗殴、偷盗抢劫，杀人越货、变卖田地、出卖妻儿等时有发生。”^{[7] (P. 849)}

诗人经过松潘西宁关时，目睹了该地人民极端穷困潦倒的生活场景，对此《松游小唱》记述到“西宁关，大不好，蛮烟瘴雨，令人烦恼。街道店屋，朽烂尘嚣，酒馆茶轩，帮闲胡闹，不修边幅过终朝。男女混淆，大半无聊，贩烟设赌营霄小。指画鸳鸯桥，鸳鸯飞去桥倾倒。是穷乡，少富豪，数十年无人修造，当地人就如此把一生白送了。”^{[1] (P. 88)}在这里，是朽烂不堪的街道，帮会分子在酒肆茶馆无事生非，男男女女不修边幅，无所事事，醉心于烟馆赌场。此地人民如此暗无天日的生活场面的写照，实际上也是松茂古道沿线的整个边远地区乃至整个晚清中国社会的缩影，写者痛心，读者潸然。这里诗人写到的赌场和帮会，在整个松茂地区也是泛滥成灾的。《松潘县志》载“民国时期，松潘赌博之风盛行，赌具有‘麻将’、‘骰子’、‘纸牌’、‘扑克’等，许多大商贩、政府官员把赌博作为洽谈生意的媒介。民国十三年（1924），灌县人李吉伍在漳腊金河坝设立赌场，号曰‘三明社’（即仁、德、礼），此后，安岳、江津、永川等地人相继在金河坝建立赌场。民国二十四年（1935），‘复源常’商会会长郭国林在县城南街开设赌场，民国二十七年（1938），杨度三在城中成立‘永昌和’赌馆。一时间，赌博上瘾者无数，有以钱、物作赌注，有押房屋、田产赌博，更有以妻子儿女为注赌博，输者无力还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因赌博而闹出人命、沦为盗匪者，为数不少。”^{[7] (P. 849)}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巴蜀最大的民间帮会组织，其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至今川西平原民间还留存着“哥老馆”的口头称谓，即是明证。袍哥会在保路运动中曾被同盟会利用作为骨干力量，引导农民推翻清朝统治，护国战争中，同盟会方面又再次拉拢、依靠袍哥，袍哥武装再次集聚，在各地作战。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司令、副司令、参谋长都是原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应该说袍哥会在历史

上对中国社会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作为一个庞大的民间社会组织，袍哥会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而存在的，其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才是巨大的、主要的。《汶川县志》载“20年代后，袍哥组织恶性膨胀，无法无天，吸烟设赌、购枪拉伍、拦路抢劫，相互残害，估吃霸除、奸淫烧杀、鱼肉乡民、无恶不作。此时的成员除官、绅、吏、霸、兵、匪、警、宪外，还有地痞流氓。真正的穷苦百姓每年要分摊招待费、棍子费（人头费）、关刀费，大爷和五排以上的拜兄、生葬、娶嫁都要摊份子钱，未参加袍哥的人（称‘空子’）也时被敲诈勒索。”^{[11] (P. 772)}袍哥组织对社会的危害不仅仅体现其本身的罪恶性质，更体现在因它而衍生出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上，在董湘琴松游之行经过的地区乃至整个川西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其影响，社会矛盾尖锐，各种社会问题积弊丛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路走来，诗人董湘琴目睹并感受着松茂古道沿线地区的社会民风，时刻流露着忧国忧民的士子情怀，在终到松潘时，诗人回首这段行程感慨道“愿邦人把富强心抱定，观察川西一带民俗风情。且筹算，圣教化夷固邦本。”^{[1] (P. 91)}这是诗人对当地人的期盼，也正是今天的国人为之努力的方向。在晚清的中国，仁人志士们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成为了一次次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动力源，从此角度来看，诗人发出的这一声呼喊，可谓是晚清要求社会变革的初啼，是极具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松游小唱》中，董湘琴多次对松茂古道沿途的少数民族同胞使用“夷人”等歧视性的称谓，写“小关子”一节称封建王朝统治者连年对此地用兵镇压，换来太平，这种带有民族歧视的意识倾向也是当时士大夫大汉民族意识倾向的写照，是应该予以一定程度上的批评的。此外，《松游小唱》提到的松茂古道沿途的许多地名，皆带有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如“镇夷关”、“平夷堡”、“靖夷堡”、“永正”、“归化”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镇压。当然，对于诗人的这一错误民族意识倾向，我们不应草率地归全罪于董湘琴，他此行目的是赴松潘厅入幕，作师爷佐总兵平藏民之叛乱，由其立场可看出此地

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对立，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根源乃民风蛮夷，在历代怀柔失败后，就是镇压。其时其地的这种民族歧视现象，是有历史渊源可寻的，即“大汉族主义”，我们要批判地看待诗人的立场。诗人本是羌人，由他的这一民族意识倾向，也可看出他受汉文化同化出现了民族认同的混乱。

结语

今天来看，松茂茶马古道文化与董湘琴的《松游小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相成全的关系，二者的价值都将因彼此而最大化。松茂茶马

古道文化在今天可以说是不为世人所熟知，不被文化界所重视的，它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价值面临着被时间和历史湮没的危机，亟待今人的发掘和抢救。而董湘琴的《松游小唱》恰好为我们认识和发掘松茂茶马古道文化搭载起了一座桥梁，同时它也为我们在“5·12”强震后的今天重建岷江河谷文化提供了参照和依据，为我们修复和重建松茂茶马古道沿途地区的诸多珍贵历史遗迹增强了可能性。相信在对《松游小唱》所包含的松茂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全面认知的基础上，再来建设和保护松茂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势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绩效。

(参考文献)

- (1) 何正泰. 松游小唱校注 [M]. 香港: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1993.
- (2) 贺敬之. 贺敬之谈诗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00.
- (3) 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4: 202.
- (4) (唐)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12.
- (5)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增订版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461.
- (6) (清) 四川通志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影印本, 1984.
- (7) 松潘县志编纂委员会. 松潘县志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 (8) 黄红军. 车马·溜索·滑竿: 中国传统交通运输习俗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179.
- (9) 杨武泉. 岭外代答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10) 四川省编纂委员会. 灌县志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 (11) 四川省阿坝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汶川县志 [M]. 成都: 民族出版社, 1992.

On Ditty in Pine Woods and the Culture of Songmao Ancient Tea-Horse Road

ZHANG Q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Abstract] *Ditty in Pine Woods*, a long travel poem written by Dong Xiangqin, a Qiang minority poet of the Qing dynasty, reflects abunda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Songmao Ancient Tea-Horse Road. The long poem was almost lost because it was passed down by oral tradition only along the road. It is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alues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mak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long travel poem. At the same time, with regard of protecting minority's cultural heritage, *Ditty in Pine Woods*, as a very important work of local celebrity, reflects the culture and life of Han, Qiang and Tibetan ethnic groups living along the road 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poem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well protected.

[Key words] Qiang literature; Dong Xiangqin; *Ditty in Pine Woods*; the culture of Songmao Ancient Tea-Horse Road

(责任编辑 白玉柱)